

重点  
阅读

## 你的作家梦,早已成真

□毛宪文

我与张兴渠同庚。说来也巧,不但同庚,而且是同一届(1952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张兴渠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我们都是中文系。我们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颇为骄傲。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党和国家为了全方位医治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建设需要人才,当时人才奇缺。所以国家决定,大学毕业生由教育部统一分配,成为国家的香饽饽。正像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动员首都应届大学毕业生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时说:你们是凤毛麟角,国家建设需要你们热情投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写了服从统一分配志愿书,怀揣着各自的理想与梦想等待分配方案的公布。

1952年7月15日那天我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捧在手中无比激动。当天教育部组织我们到北戴河进行野营军训。由解放军军官接管连编制,我在一营二连出操站岗。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每人打靶训练,我举起三八式连发三弹命中0环。虽然成绩不佳,也是我平生换过枪把子的创举,永难忘怀。短短半个月的野营生活,体会到解放军转型的官兵关系。

野营结束,回到学校,当天就拿到分配通知。我被分配到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是公认的作家摇篮。我高兴得跳起来,不知如何表达,竟然抱起了乐黛云转圈,因为她当时是系分配组成员,以表感谢。

第二天陈森(丁玲秘书,作家)来北京大学把分配到文研所的我和王有钦(贺朗)、谭之仁(白榕)、曹道衡、张保真接到北官房小院宿舍,开始了我的作家梦生活。

其实我的作家梦在读高三就已萌生,当年在北京求实中学读高三,国文教师是著名的民俗学者金爱申。有一次作文课金老师让自由命题,文体不限,必须当堂交卷。当时我寄居在同学刘延广(后来台湾郑成功大学研究古文字)家中。这位同学家境贫寒,每每为吃穿发愁。有次煤球烧完了,下学后饥肠辘辘无法煮饭,囊中羞涩的他不知该怎么办。无奈找到煤铺和送煤师傅说明情况,想熬100斤煤球。那位师傅听后毫不犹豫地说:“不能断炊啊,你先回去,我马上送到。”这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就以送煤工为题材,写了一首诗,题目叫《煤黑子黑》,其中有这样几句,诗曰:“煤黑子黑/煤黑子累/煤黑子脸是黑/脸脏心却红/心中一团火/温暖万千人”。不料这习作被金老师看中,把它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讲评。

此后,我稚嫩的心灵萌发了写作的念想,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块料,决心报考大学中文系,将来成为一名诗人、作家。

这样看来,其实我和张兴渠做的是同一个梦,所以进入中文系。当时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老师多次在公开场合说,我们不培养作家。我以为他的原意是让学生认真学习所设课程。学生一心想当作家,去搞创作,必然耽误了课程。同学们私下有意见,但不敢向杨晦老师挑战。杨晦老师五四运动时是火烧赵家楼的英雄,一贯是以左派教授著称,谁有胆子与杨晦老师对抗。但事实证明杨晦老师说的不一定全对。我们系就出了乐黛云、曹道衡、王有钦、谭之仁、林志浩等作家,我也忝列作家行列。

我们在北官房住下没几天,有一次陈森进来说,大家出来欢迎上海来的两位同学,一位叫张兴渠,一位叫杨文娟。我们纷纷跑到门口欢迎他们。张兴渠中等个头,衣着朴实,一点海派味道都没有。我与他握手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跟你做同学很高兴,望你多多关照。他颇多礼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于杨文娟一派娇小姐作派,据说是资本家出身,后来很少与我们接触。

1952年9月1日文研所正式开学。同学中有辅仁大学的龙世辉、王树芬、王文迎、刘蕊华、宋淑兰,还有不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如玛拉沁夫等。

第一课就是丁玲辅导我们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以自学为主、小组讨论为辅,丁玲给我们作辅导报告,重点是解读文艺为谁服务,怎样服务。为了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先要解决立场问题,解决立场先要改造思想。当时我对这两个问题特别不明白。什么叫立场?思想怎么改造?不但在小组会上发问,甚至在丁玲作辅导报告时也贸然举手提问。丁玲说,课后我给你解释。课后她说,立场就是你站的位置。比如说,同样对待下雨,久旱农民认为是甘雨,你正准备去出游,就说是霖雨。对待雨的态度,因为站的角度不同,看法就不同,这就是立场。所谓思想改造,就如下雨问题,由于立场不同需要改变,思想改造就是要一切以人民大众着想。像这样浅显的问题,我没见兴渠发过问。后来我仔细细观察,兴渠是个内向型的人,深沉有修养,很少说话,但很用功。我们除学《讲话》外,还听名家作专题报告,如郭沫若讲诗,茅盾讲小说,郑振铎讲新文学,李何林讲鲁迅,曹禺讲戏剧文学,都是名家大家授课。课堂上兴渠总是低头做笔记,课后有一次我好奇地翻看他的

笔记本,密密麻麻几乎把名家的话都记下了,成了速记员。可见张兴渠的速记功底深厚。给我突出印象的还有他在“课外”的功夫。文研所的教学计划每人一份,列了许多参考书。他把书目一一写在笔记本上,并列阅读进度。我看了他的阅读计划,内心颇为震惊,其阅读之速度,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别看他寡言少语,其实主要是内功。我的同屋曹道衡,特点就是读书多,他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情有独钟。我看兴渠与他颇像,夫子女子浓浓的,他们两个都是上海人,也真巧了。后来我瞄上了张兴渠的夫子女子,一点不错,他像海绵一样随时随处吸纳营养,就连小组会上我那幼稚可笑的发问,他都记在笔记本上,可见其用心之深。作家留心生活,积累细节,这是素材的来源之一,足见其用心。

他的用心还表现在记日上。当时文研所有两个班,我们大学毕业生是研究生班,还有一个班叫研究员班。那是丁玲文研所最初的学员,是在革命斗争中有创作成绩的学员,如陈登科、马烽、胡昭、胡正、徐刚、白刃、王学波等等,这些都是革命锻炼中涌现的作家。张兴渠利用同学的关系,抽时间去拜访他们,而且写了许多访谈笔记,内容多为创作过程及如何留意生活中那些金子般的素材。我在后来才发现这些是张兴渠“淘宝”的秘密,也可见兴渠成为作家有自己的“秘方”。

我的性格外露,思维简单,也和个性有关,所以我的作家梦在高三萌生后,与人谈话或写文时有流露。而张兴渠由于内向,他的作家梦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文章散见全国各地报刊,如写丁玲怎么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马烽如何成名、陈登科的《活人塘》的魅力、玛拉沁夫写的科尔沁草原怎样诱人等。还有一次我受《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的委托向茅盾约稿,我发现几处用词有问题,向韦君宜汇报,韦君宜认为我讲得对,让我去找茅盾先生。我去文化部说明情况,茅盾先生说稿子给编辑部,编辑部有权处理,按你们的意思办。张兴渠据此写了《茅盾不摆大作家架子》,据说他的这篇文章收到许多读者反响。

张兴渠的文字短小精悍,言简意深,文章虽短,却有细节、意境,而且语言优美,颇富故事性,有情趣,可读性强。他把所记在心里,提升主题,周密布局,每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表现得有滋有味,余韵无穷。希望他笔耕不辍,勤奋依旧,写出为更多读者所欢迎的新作。

(《文艺艺海录》,张兴渠著,文汇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 文学与我同行

□张兴渠

我小时候,家住在一个商业发达的港口。当时曾患过一种罕见病,听人说是“黑热病”,由于缺少药很危险,家人很焦虑。离家十几里的有个地方叫海州医院,可以治这种病,但医疗费昂贵。母亲为了救我,变卖了她喜爱的金银首饰。父亲为了节省车钱,徒步背我到医院求医治病。在父母的关爱下我的病渐渐好转,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十分感恩父母,想到将来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

幼年时代的这件事深深烙在我的心里,父母给我的爱,始终温暖着我的心,我很想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后来作家冰心的《寄小读者》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喜爱,文中的母爱感人肺腑。这篇文章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得知冰心和我一样,也是出生成长在一个海港,也向她学习把我这些感受和经历写出来。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作文,在学校引起了轰动。一位姓屈的国文老师对我的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生,平时教课对学生很严格,他读后把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引起了许多同学的共鸣。后来这篇作文被一位同学摘抄投寄到《镇江日报》,不久居然发表了,当时我虽然未收到稿费,但投稿成功的喜悦感至今难忘。从此我喜爱上了文学,为我走上文学写作道路,奠定了基础。

1948年,家父因病去世,家里的大哥成为顶梁柱。所谓长兄如父,父亲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我日后好好念书,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大哥遵照父言尽力培养我读书,他托了一位好友把我带到上海,帮我考取了上海的震旦大学。我在该校中文系读书时结识了许多很有才华和学问的师友,诸如王元化、何满子、贾植芳、丰子恺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文学水平大有提升。但是由于缺乏自信心,疏于提笔,没有长足的进步。

毕业后我有幸被选拔推荐到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一步深造,从此,我踏入了文学的摇篮,成了一名研究生。此时,我接触了更多的名作家,对文学的喜爱和向往更迫切了。毕业后,我又回到了上海,在实验京剧团(上海京剧院前身)工作,又有机会接触到了一些文艺界的老艺术家们。他们对我的事业成长影响很大,我同时也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特殊生活情境以及经历,这使我感受到他们事业发展和成功的不易。在我写作过程中,有几位过去在文学研究所一起学习的校友对我帮助很大。记得其中一位是谭之仁,他经常鼓励我写东西,还在《安徽晚报》上为我专门创办了一个专栏,叫“品戏斋”,我就把当年在剧团里的一些事以及一些人物写了出来,后来陆续发表了。

记得在我刚开始写作时,很多地方都搞征文活动,我应约写了好几篇征文稿都被录用了。2003年非典肆虐时,形势很紧张,当时我女儿在杨浦区疾控中心一线工作,非常辛苦。作为独生子女的她,没有办法经常来看望我们,我们为女儿对国家作出的贡献而感到光荣,同时也为她的身体健康担忧。我把这种感受写成了题为《一位父亲致女儿的信》的文章,投寄给《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以大标题形式刊登并加编者按予以点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关注,不少单位还将此文作为学习的材料,来激励大家抗击非典的热情,上海图书馆还派人登门慰问,并把文章存入档案馆,作为历史资料之一。这使我认识到,好的文章能在社会上产生正能量的作用和影响。我写文章的劲头更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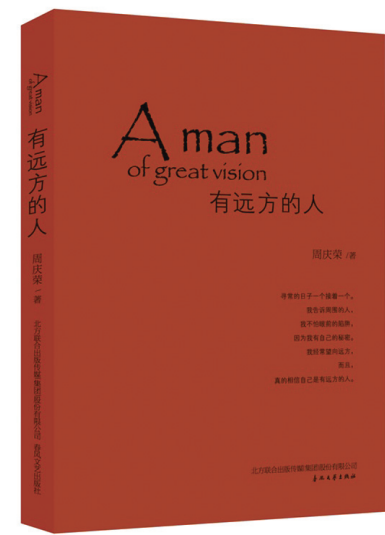
写文章充实了我的晚年生活,目前已成为我最愉快的事了。近10年来,我投稿越来越多,许多杂志和报社都纷纷来约稿。虽然在文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还是惭愧我并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怀揣着一个作家梦!我时常感觉到现在正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盛世,盛世出人才、出作家、出科学家。社会的不断发展,使人们的美梦也更多了,我的梦也比过去做得更深、更甜蜜、更充实了,离现实也更接近了。我的梦就是做一个作家。

当然,我的写作水平还很有限。去年10月,北京的老朋友包立民鼓励我将近几年来所写的文章出一本专集,我取名为“文艺艺海录”,主要内容是说文艺界的一些旧人旧事等。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二本专集,第一本是我女儿和女婿在庆贺我80岁寿辰时帮我整理历年发表的稿件而出的一本文集,名为《履痕寻踪》。对我来说这辈子能出两本书,已觉得非常满意足了。

### ■开卷絮语

## 堆积是海,放开是江

□李犁



周庆荣是一个有胸怀又有境界的诗人,于现实他递上肩膀以及悲悯和关怀,于远方他递上心灵以及梦想和热爱。这让他诗歌透出劲健与温暖、深邃与澄明的光芒,他一边铸剑一边育花,他的诗歌里有火焰也有芳香,是泪水和露珠的融合。而这一切都是他主动为之,这让他成为一个勇气与骨气、血性与人性合二为一的诗人。

我从周庆荣的散文诗中读到了一种浩荡,这是洪流也是岩浆,更是浓缩的雷霆和风暴。整整一个夜晚,我被他作品中的这种力量牵引着,我的眼前幻化出一支像飓风一样摧枯拉朽的旗帜,“雄起!”我很自然想起这个雄壮的呼号。是的,周庆荣的散文诗是雄性的,也是阳刚的,这在我们疲软的时代,尤其是沉陷在床第与糖分过剩上的诗坛,他的这些文字就是青铜做成的钟鼎。周庆荣是用他的勇气和担当,还有孤独的英雄主义在给这个写作的坛子补钙,甚至补钙。

周庆荣从他的写作伊始就拒绝琐屑和无聊,贯穿他作品的血脉就是求真、真相和真理。所以他要把去所有的杂质,挤出诗歌中的虚妄和杂质,让真相裸露出来,或者把他的文字磨成快刀,把伪装挑开,把真理逮出来。这说明庆荣是一个有良知的诗人,是一个清醒又自省的人,是一个有着悲悯情怀又敢于面对黑暗和丑恶揭竿而起的诗人。这让他放大视野,并把正义感和同情心还有大爱和大痛一起放在熔炉里,烧红锻打再淬火,成无坚不摧的剑,成为他诗歌中的钢筋铁骨。所以在他的散文诗中总会看到一种光芒,这光芒深沉而醒目,它执着地引导着我们的灵魂在激情澎湃之后走向思想和觉醒。这正是他散文诗的内核:正义、救赎、热爱、自由。一切由此而辐射,一切由此而繁衍。这也是庆荣的思想之锚,是他献给世界的炽热的心。

如果说现实让他痛让他想让他把诗铸成剑,那么远方就让他爱让他诗让他把文字培育成花朵。而远方和花才是他的最爱,才是他的方向和终极。远方是超越,是爱是人生之诗。那么人为什么需要远方?怎么才能到达远方呢?

从生命学来说,人天生对远方有一种企盼和向往,提起远方,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甚至躁动。对于诗人来说,远方就是诗,就是爱,就是美和自由。生命需要提纯,人生需要升华,生活需要美轮美奂的境界来照耀,来使人生充满意义和光芒。对于周庆荣来说,远方就是诗化了的

出生的地方,那里阳光干净,亲人慈祥,所有的风景都美丽静好:“我背靠着老屋,守着最初的朴素。像我们众人所依靠的许多事物一样,它们已经破旧,但拥有最后的力量。/爱你,就爱到最后。/老屋不说话,老屋只慈祥,在故乡的暖阳下。”这是多么亲切和谐的人类情感的故乡啊!这就是诗人要去的远方,这里有完整的人性、完美的情感,这就是最真最自由的美和诗。难怪有人说失去的天堂才是最美的天堂,要抵达的远方就是童年就是大自然就是家。因此,去远方就是回家和回归。向童年回归,向大自然回归,就是追求那种真实和自由、澄明和纯净、人性和神性的境界。这境界一尘不染,阳光普照。她是神性、天性、人性的融合,是爱、美、自由的统一。因此可以总结:最远的地方就是最初的地方,超越就是回归,神性就是人性。我们期盼执意寻找的东西就是我们最开始拥有的东西。

至此,我觉得周庆荣的散文诗写作也已经进入到返璞归真的境界。不论是年龄还是心胸还是技术,他都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阶段,他正在去除胸中粘滞,澄心以空,以空待静,用婴童的眼睛和赤子的心灵来接纳诗意的莅临。诗之于他如水般柔顺,他堆积了就是海,放开了就是江!

与此同时,散文诗与自由诗的界限已经模糊,散文诗与自由诗不过是剑与长矛的关系,两种兵器,看谁更熟练而已。在这样一个自由解放、规矩渐失的时代,散文诗也许更能让人得心应手。如果那位硬要说散文诗就是边缘的诗,那就只能这样说,周庆荣的贡献在于他深远的意境和美和如锚之思,把散文诗提升到与自由诗比肩的地位,甚至是对自由诗的侵略和逼宫。到这里,诗人面对现实苦难时那种愤懑、激烈和焦灼的情绪开始减少。诗歌的审美逐渐代替了情绪的审美,让我们看到一个抒情歌手在吟唱。虽然声音低沉忧郁,还时不时地剑拔弩张,但他开始有意识地歌唱梦想与花朵。艺术规律告诉我们,不要让情绪过分的激烈,太猛烈了就会破坏诗歌的美感,把这种疼痛稀释在诗歌的细胞中,让它在诗歌美感和哲学意味的感召下,一点点将疼痛渗透给读者,这不但不会减少诗歌的同情心,反而会使这种疼痛具有了美的品质,同时也使诗歌更有力度并具有沉郁的美。

(《有远方的人》,周庆荣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 疑似珠宝鉴定

□王祥天



王春林是我的朋友,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曾经一次次在寒风和烈日下赶往太原的某个宾馆开会。那是一个对文学而言人们既热情又认真的年代,那是一个把文学当做神圣事业的年代。多少年过去,多少人早已变做“浮光掠影”,而王春林却还在那里,而且在人们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我始终认为王春林是古代契丹人的后裔,气力极足,喝酒写文章,其气概是勃勃然不可遏止,其思绪之活跃非同寻常人可比。王春林读书之勤苦,只要看他最近所出的两本论著便可见一斑:《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且不说其中的观点如何,分析是否妥帖而深入,单只说王春林的阅读量,便让人格外吃惊。闲来无事读长篇小说是件快意的事情,而把读长篇小说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或学术命题,便很难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王春林却选了这样一件事来做。一是因为他的有心——他对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走向与作家成长个案的关注;二是他有愚公移山般的态度,我总是和他开玩笑说:“你当愚公便准备被累死”。读长篇,一年一年地读下去,而且还要把每年的长篇都一一梳理作比较,这活儿可不轻。作为一个评论家,大量而且不是消遣性的阅读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肩担日月”地非要来做这件事的评论家在中国真的没有多少。而王春林却一直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在做这件事。

读王春林的这两本专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的长篇状况,这里当然包含了意识形态方面乃至文学思想的微妙走向及变化。这一点我以为最重要。我们读一部长篇,或者是每年读几部或十几部,但我们的感觉总是散碎的,而作为评论家的王春林却要把这散碎的感觉合在一起,让你如忽然跃身于高空鸟瞰下界,这种学术关注不是随便哪一个评论家都能得来的。这基于王春林对文学的热情和执着。读这两本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学术专著,我对老朋友的敬意忽然有加。王春林是以极大的“劳动力”(我想使用一下这个与文学看似无关的名词)投入到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研究之中,并且据此能够让我们看到一张颇具真实度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细细想来,这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既要大量细读,几近于“披沙拣金”,又似珠宝鉴定,披沙拣金是量,珠宝鉴定是质。关键在于,作者面对的是中国一年又一年长期累积下来的长篇小说。“反顾与沉思,关注与透视,描摹与展示”其实是应该放在春林的身上。要谈论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就少不了作对比,怎能不把现代与新世纪之前那许多年的长篇小说

搬出来?如不作这样的对比,你怎么能够说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走向个性,走向成熟”?更重要的是,王春林对新世纪长篇小说的一个定语是“现实主义主潮地位的加强与拓展”。什么是“现实主义”这我们都熟知,而“现实主义主潮”之表现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个什么状态?王春林研究和深入分析的用功之处便在这里。我以为,王春林对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地图”和“风景”扫描的结果可以分为两个大方面:一是内容,思想与意识方面的呈现;二是形式,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在形式上的一大特点是“多样化文体的尝试与实验”,这一点发现十分重要。在文学的各种文体中,长篇小说在“尝试和实验”上应该说来得最晚。但它毕竟来了,它毕竟被评论家王春林这部“长篇小说分析机器”扫描到了。

读王春林这两部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学术著作,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个案分析”。王春林如同尽心称职的珠宝鉴定师一样,把一件一件长篇拿起放下,细细琢磨,悉心品鉴。比如对《繁花》这部长篇的分析,我以为就显示出了王春林独到的眼力,一是肯定了它在“上海叙事”中的历史地位,二是对《繁花》叙事上的特质有深入的见地。仅此两点便足矣,足以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一种导游式的好建议。

一个评论家,若想对中国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进行完整的扫描与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件轻松的事,而王春林却一直在这么做,且从宏观到微观都能给喜欢中国长篇小说的读者和研究者以清晰的阅读引导。这两本书刚刚出版不久,再过若干年,想必它们会对未来的研究者有更好的帮助,让未来的研究者能够清晰地看到对我们来说是“新世纪”,而对他们来说是“老旧的世纪”文学方面长篇小说的风景和为了更好地欣赏这风景而提供的地图。

我常常觉得王春林是在做一件“傻事”,在当下这个文学早已被边缘化的时代,这样两本厚厚的书,又能有多少读者呢?这么想的时候,我便再次明白文学的真正激情和神圣所在。九九归一,文学是我们共同的宗教,南无,南无。

(《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王春林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王春林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